

【從影像反思白色恐怖的記憶政治】座談會與談人結論¹

范雲：

我想先回應夏曉鵬提的問題，她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剛剛所用的語言中，階級的語彙是這樣的隱晦？我覺得這問題非常有意思，因為剛剛很多人不斷地談左，包括張釗維的紀錄片叫《消失的左眼》，可是夏曉鵬覺得我們的階級語彙很隱晦。這的確反映了一個更本質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用「左」而不用「階級」？那左到底是什麼？左是不是階級？我們心中的左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或專政？或是一個福利體制的社會正義分配？還是純粹只是一個對中下階級，甚至我們是用「勞苦大眾」這樣語言的人道關懷？左到底是一種價值還是一個政治路線？這些問題在台灣的社會空間中我們從來都沒有真正地討論清楚。也因為沒有被討論清楚，我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共識，所以只能用個人主觀但也隱晦的方式來談，談的比較像是一個價值而不像是一個政治路線。夏曉鵬的問題正點明了這樣的狀況。

今天我為什麼會談我們要清理白色恐怖的負面遺產，包括對左的無知跟不了解，包括我們沒有能力去分析批判資本主義體系。夏曉鵬點出來的問題正是這樣現實貧瘠的狀態。我們不能跟經濟學家談左，因為全部都是右翼，他們關心的是市場中的效率，連右翼的社會學家都受不了他們，更何況是左翼的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所反映的是台灣社會對左的社會分析、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到目前為止發展的都還不夠細緻。

另外我還想說的是，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人們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去改變歷史。在台灣我們沒有階級的語彙，我們用的是有錢人跟沒錢人，統治者跟被統治者這種分類。我們有很多族群的語言，有日本人跟我們台灣人，有本省人跟外省人，有這樣的族群語言。這也反映了台灣作為一個被殖民社會的歷史跟悲哀。而我的想法比較像剛剛說的——「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去改變它」。我覺得，這樣的民族主義迷霧不處理的話，那我們要所謂的階級語彙事實上很辛苦，因為那歷史迷霧就在那裡永不散去。所以白色恐怖的歷史對我個人來講，如果有任何一絲政治改造與社會改造路線的 *implication* 的話，我還是相信一個多重戰線的聯合，但是，要經常的對話。

江宜樺：

各位出了這個會場之後，請千萬不要對外面說，江宜樺講歷史真相的追尋不重要，因為我沒有這樣講。江宜話講的是，轉型正義對他而言不會是一個指導社

¹按：限於篇幅，無法整理所有與會來賓的觀點與發問，在此僅謄錄引言人座談結語。

會前進的最高原則；而許多人相信轉型正義可以帶來社會的和諧，江宜樺也認為不一定具有這樣的關係。真相重不重要？重要。一個人如果不了解他周圍的世界、以及不能夠知道發生在他自己以及先人身上的歷史的話，那是連一個最起碼的起步都沒有的。但是真相是不是整個人類所追求的標的之中最高的，我不敢講，這得讓每一個人自己去判斷。對我而言，我相信人道主義、也就是說一種人文的精神，比所謂的真相或是秩序等等都來的重要。

那麼在知道真相或者知道部分真相之後，對我來講更重要的是什麼？我認為是適度的去安置記憶。今天座談會的標題是「記憶政治」，記憶政治似乎要提醒我們不要遺忘，彷彿記憶才是對的，遺忘是不應該的。但問題不是這麼簡單，因為健康的生命既要適度的記憶，也要適度的遺忘。我今天早上在教我小孩光合作用的化學方程式，我教完之後跟他說，如果以後你忘記了也沒關係，我自己其實也是忘記了，是今天爲了教他才又記起來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腦袋塞不下那麼多的東西。每個人大概都會決定哪些東西他要留存下來，放在他心靈抽屜裡的某一個角落。至於在哪一個特殊的情形下當事人要將它重現，這不是我們能夠預期的。

剛剛提到階級的那個問題，我會這樣想：階級存在，階級有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就像是有的人相信民族、性別發生作用一樣。它是不是解釋所有社會問題最主要的關鍵，我自己的淺見認爲不是，這也說明了長年以來爲什麼我會被人家認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不是個社會主義者，最多是一個所謂的自由主義左派。我從來不認爲階級是那個綱，一旦拉起，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我認爲很多東西都在發生作用。可是在這裡我要補充一點，哪怕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哪怕認爲階級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怎樣才能夠讓階級問題得到解決，我覺得可能還是得找到一個可以和平進行競爭的政治架構，而這就是我剛剛所講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走到最後不得不發展出來的東西。在這個點上，也只有在這個點上，自由主義跟民主社會主義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謝謝。

簡錫堃：

有人問到階級的問題，而我從事的和平運動跟這又有什麼關係？我是從內心裡對甘地、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那樣的論述自然接受。「和平」不是和稀泥，和平本身有它的公義存在，而它的公義必須去實現，但是它有不同階段跟手段。

1988年，我代表新潮流到日本跟當時在日本的台獨聯盟面對面討論怎麼在台灣合作。兩、三天的論壇，我的感覺台獨聯盟跟我的理想差太遠，因爲他們一直都用國族主義處理獨立問題，建國的理想到底是什麼從來都不提。所以回到台灣後，我說新潮流不能夠與其融入在一起，新潮流內部對左已經有意見了，這個極右的進來那還得了。那時候，「階級」在台獨運動中雖曾被提起過，但是很無

力感的。我想現在也是一樣，台灣目前的主要矛盾還是在統獨，就是國族主義運動的問題。而和平運動就是要處理這一塊，「和平」在統獨要扮演什麼角色、怎麼樣去超越，然後創造議題，讓統獨不是最主要的社會矛盾，才能回到階級問題，不然，會很困難的。現在社會運動其實有一些左派的想法，但是都很邊緣，因為整個社會主流價值不在左的思維。

要怎麼創造一個新的矛盾？就是要在資本主義中去創造議題，像是稅制的不公，就是階級議題，而挑戰租稅的不公就是要喚醒階級。所以階級運動並不是不可行，而是你在過程當中如何召喚人民對不公不義或跟自己相關的意識覺醒。如果階級運動議題無法跟人民息息相關，談左派的理想只會愈來愈困難。

坦白講，我自己是個修正主義者，不是所謂極左的消滅資本主義者。理想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什麼？我內心裡有很多北歐的東西，現在跟台灣人民講都太早，但是必須要往這方面去推階級。如果我們只在統獨當中切入，永遠贏不了藍綠，必須創造台灣社會的新矛盾，拉回社會關注階級的矛盾。像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青年貧窮化等等，如何去召喚年輕人？我覺得「階級」還是未來可能的運動，我們並沒有放棄，我們正在努力當中。

張釗維：

我就兩個部分簡單回應。剛很多人談還原真相或了解真相，借用范雲和江宜樺老師都提到的架構，有一種因為無辜而犧牲的人，有一種是因為信念而犧牲的人。對於無辜而犧牲的人，如何去還原真相，我們大概有一種想像，也有很多模式被作出了；但是因信念而被犧牲的人，我們要還原的真相是哪個部分？或者我們要怎麼去理解信念、理念的部分？舉一個例子，我在訪問李旺輝老師的時候，李旺輝是鍾浩東把他從高雄中學拉到基隆中學去教數學，他回憶說，開學第一天校務會議第一件事情就是選舉校務主任，這對他來說是個震撼，因為其他學校從來不可能用選舉，基隆中學大概是全台最民主的學校。但什麼是民主？李旺輝、鍾浩東他腦袋裡面的民主是什麼？是一個西方自由主義式的民主，還是另外有一個脈絡的民主在那裡？比方說毛澤東在延安時代所摸索出來的另一種民主概念。

第二個部分，剛剛談到族群政治，這些措辭字眼大部分都延續過去十幾年來所累積在談二二八的措辭方式，我不知道這樣的方式是不是能很準確地去討論白色恐怖？這是今天沒有談到的。這也牽涉到剛剛談的階級問題。也就牽涉到說我們用什麼觀點，不只是看現在的社會而且重新回去看過去的歷史，就是說關於正義、或者是最後價值……我沒有辦法說什麼是最後價值，但我期待有更多文學、詩歌、電影跟音樂可以創造出來，我覺得藝術的部分還是用來 comfort 所有的這些靈魂，不管是過去的或是現在的，唯一的可能的出路。我舉一個例子，即便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五十年之後，好萊烏所拍的搶救雷恩大兵，他依然是在安慰五十

年前參戰的那些老兵們。我想我們大概還有很多可以做的。

謝金蓉：

從這兩天的電影放映，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文學和電影確實是走在尋找真相的前端，包括像侯孝賢導演、朱天文導演、藍博州先生。但是對於後來更多的想要在尋找真相的路上作一點嘗試的文字、影像工作者，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切入呢？我覺得今天的討論有很多的線索，我也有些例子提供大家一些思考。

去年在台灣出版中國大陸小說家哈金，他得過美國最佳書卷獎，他寫的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小說，叫做《瘋狂》，他在小說後記寫了一段話。他說針對天安門事件他做過非常多的研究，包含口述歷史、調查、史料蒐集，可是當他真的要寫作的時候，他把所有的這些材料都放棄，寧可選擇一個無知者的角度，以一個學生，因誤打誤撞到了北京而目睹了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他選擇無知者的角度，理由是說，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他不在現場，他看到那麼多的同胞死傷，他欠缺在屍體旁邊比手畫腳的勇氣。另外一個例子是已經去世的中研院院士張光直，他是四六事件的受害者，也被關了一段時間。他去世前才終於把自己的事情作了一個表白，在他的回憶裡面提到說，他當年才高中生就因為這事件被關，被關出來之後對人之所以為人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所以他當時才去考台大人類學系，他說這樣子的話我應可以好好研究人之所以為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他因為是考古學家，所以可以在屍體旁邊比手畫腳，他自有他自己一個專業上的價值的追求。

剛剛提到很多聽眾的發問，都集中在說，很想繼續去了解這方面的歷史，我想現在的史料的確相當多，也有一些不錯的範本我覺得還是可以在提一下。剛剛提到說，在歷史的解密過程當中，有一些確實不錯的書。昨天鄭鴻生提到揚克煌，他有一本書《我的半生記》是寫謝雪紅，他用了非常平實的寫法，替謝雪紅作了非常完整的敘述，當然他有他身分上的方便，是謝雪紅後半生的伴侶。我覺得一般人很能夠透過他的書寫去了解。

另外一個例子，關於是否所有加害者都要出來列隊，台灣在這方面文學上的嘗試，曾經有一些非常大膽的實驗，雖然到目前為止討論的並不多。也是中研院的院士王德威曾經特別推崇台灣的保釣作家，目前多住在美國，叫做郭松棻，曾經寫過一篇《今夜星光燦爛》，寫的就是陳儀，雖然他沒有指名道姓。我想對於這樣一個、剛剛說應該是第二個列隊出來的人，我們應該怎麼去看這樣的歷史人物呢？另外一個是，郭松棻的太太叫李渝，她寫過一篇《菩提樹》，裡面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寫說，當時的外省教授如何在營救因為白色恐怖而被抓去關的學生。我想關於像這些在文學上的嘗試，確實可以給大家在尋找真相、尋找不同的聲音時一些參考。謝謝。

藍博洲：

我只談一兩個問題。剛剛有人對所謂「台灣第一、台灣優先」批判，我是同意的。但是也有人主張「台灣第一、台灣優先」，我也同意。聽起來，我很投機，兩邊都同意。但問題就在這裡。這些口號、這些抽象的論述，我們都同意；問題是，這裡還有一個前提，就是到底在認識上，哪一個比較正確？今天最流行的「愛台灣」的口號，問題也在怎麼樣去愛吧！現實是，某些人認為：如果你跟我不一樣，你就不愛台灣。我想，問題就在這裡。

回到這個片子，關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也是一樣。前面，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辦法把二二八與 50 年代白色恐怖的區別談的比較清楚，可是我相信影片本身應該講的很清楚了。剛剛艾琳達的說法，我也不陌生，很多台獨派的朋友都是這樣講的，就是 50 年代白色恐怖是二二八的延續。我不否認：50 年代白色恐怖與二二八有延續性。可是，他們這樣的講法是不對的，他們的意思其實是要說：50 年代白色恐怖基本上還是二二八。事實上，兩者的確有時間上的延續性，比如說有人的確是因為二二八的案底而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抓。可是，這跟 50 年代白色恐怖是不是二二八的延續是兩回事。我的意思是說，二二八是很單純的官逼民反---一個地方性的政權施政不當而與民間衝突，民間起而抗暴。但 50 年代白色恐怖卻不一樣，它是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而在民眾還沒有展開反對行動之前就主動的、有計畫的展開的政治肅清。

因為這樣，我認為，到底受害者當中有幾個共產黨、幾個左派、誰是無辜的、誰又是真正有信仰的參加組織者，這些就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了。那麼，聯繫到有人談到的所謂「加害者」的問題，我認為，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這些也都不是那麼重要的問題。比較重要的是，首先，我們要問：這個悲劇性歷史的實態是什麼？再來，我們要進一步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歷史悲劇？悲劇是從而何來？究竟是在一個怎麼樣的歷史架構之下產生這些悲劇？

今天，我們這些人憑什麼去算個別的所謂「加害者」的帳呢？我不是說「加害者」沒有任何的道德責任或歷史責任，而是說我們憑什麼去算一個軍法官、特務或是警察的帳？我們憑什麼？要算帳可以，但是我們要進一步問：是誰授權給這個特務的？是保密局局長授權。那麼，保密局局長又是誰授權的呢？算到最後，帳，當然是算在蔣介石頭上。問題是，我們還要問：誰又支持蔣介石去殺人？蔣介石殺了這麼多台灣人（所謂「外省人」先不算），他又跟誰報告？答案是他跟美國報告。關鍵就在這裡嘛！可是，那些強調要對所謂「加害者」算帳的人卻從來不談這樣的問題本質---50 年代白色恐怖究竟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悲劇？真正的元兇是誰？儘管真正的元兇到今天還在左右我們台灣當前政局的走向。

我想，歷史跟現在還是有關聯的。今天我們來談這些歷史問題，為的就是要關心現在。我們都希望通過這樣的歷史反思，可以讓我們知道怎樣真正愛台灣，知道怎樣才能讓兩岸避免再度內戰；因為我們都希望台灣人民可以在和平的狀態下走向未來。如果是這樣，我們看這部紀錄電影就會比就有意思。因此，我個人認為，我們最終還是要追究 50 年代白色恐怖發生的歷史構造，它就是---這部紀錄電影清楚交代的---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的雙戰構造。

一直到今天，海峽兩岸的內戰狀態遠遠還沒有結束。怎樣去看待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於是就影響了我們今天是統？是獨？談階級或是談人道的立場。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的話，我個人以為，不管什麼派的人當道，台灣人民的悲劇還是會持續下去。我們只有正視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進而努力去解決台灣社會矛盾裡頭最主要的矛盾---兩岸矛盾，未來才有可能走向光明之路。我們當初拍這部紀錄電影的想法就是如此，到今天，我認為，我們幾個工作人員的想法還是如此。

（錄音謄稿整理：沈昌鎮）